

影响文学翻译修辞选择的语言外因素*

贾英伦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郑州 450046; 河南大学, 开封 475001)

提 要: 文学翻译过程实质是一个修辞选择过程, 文学翻译修辞是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语言内部因素对文学翻译修辞的影响已成为一种共识, 而语言外部因素对翻译修辞的影响未引起译界足够重视。本文探讨影响翻译修辞选择的3个主要语言外因素: 作者形象、译语环境和译文读者。译者进行修辞选择时必须重视这些语言外因素。

关键词: 文学翻译; 修辞; 作者形象; 译语环境; 译文读者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6)04-0119-5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6.04.027

Extra-linguistic Factors Affecting Rhetorical Selection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Jia Ying-lun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Power, Zhengzhou 450046, China;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The essence of the literary translation is the rhetorical selection. The literary translation rhetoric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ranslation stud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ree main extra-linguistic factors which affect translator's rhetorical selection: the image of the author, target language environment and readers. Extra-linguistic factors must be considered in translator's rhetorical selection.

Key words: literary translation; rhetoric; the image of the author; target language environment; target readers

戈宝权指出, 翻译的问题在于悟, 一部书译得好不好取决于译者有没有悟性。在翻译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无疑是译者。作为翻译修辞的主体, 译者可根据原作的文体特点, 在译入语修辞资源中寻找与之匹配的语言。译者的翻译观和文学素养直接影响译文的修辞面貌, 但是, 在翻译过程中, 还客观地存在一些其他因素, 对译者的修辞选择有重要影响, 例如作家形象、译语环境和读者因素等。这些因素与语言本身无关, 因此我们称之为影响文学翻译修辞选择的语言外因素。译者好比大型交响乐的指挥, 他要协调语言内外因素, 演奏出如诗如画的乐曲, 给人以美的享受。文学翻译的修辞选择既是一个内部语言学问题, 又是一个外部语言学问题。前者已为译界广泛讨论, 而后者则较少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1 作家形象

作为原作的创作主体, 作家在作品中的地位举足轻

重。但这句话未免过于抽象, 究竟作家的哪些方面在作品中起重要作用, 作家又如何影响翻译修辞选择呢?

在实用文体中, 作者使用语言的目的在于传递语义信息, 为此作者尽量使用规范的语言, “辞达而已矣”。文学文体则不然, 作者使用语言的目的在于实现语篇描绘感染的功能, 唯恐“言之无文, 行之不远”, 所以作者孜孜以求, 创造语言艺术的美感, 要给读者以美文的陶冶。与实用文体语言不同, 文学语篇的语言恰恰是要不落窠臼, 专以个性鲜明取胜, 这样, 作者必然要表现出自己独特的语言审美观。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每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 都是独具一格的修辞体系, 是语言文字用于美学功能而组织起来的修辞整体。柯尔律治(S. T. Coleridge)说文学作品是“最好的文字最好的排列”(Coleridge 2008: 97), 语言文字怎样组织、排列成一个修辞体系呢? 作家根据作品内容、创作意图, 挑选修辞手段, 加工组织, 熔于一炉。作家

* 本文系黑龙江省社科基金项目“文学翻译修辞研究”(14B086)和黑龙江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翻译理论与实践教学改革探索与研究”(JGXM_HLJ_2014053)的阶段性成果。

的这种加工组织作用,就是我们常说的“匠心独运”。而作家如何加工组织语言呢?这便是作家的语言审美观,具体地讲就是他的语言审美标准和追求。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但绝非仅此而已,它更是思想的艺术,是包含人类生活智慧和真理的社会观念形态。任何一部优秀的小说,都是意与辞的辩证统一。通常内容决定形式,这只是一个原则的甚至多少有些简单化的解释。不可否认,内容对修辞有一定的制约和影响,但决定修辞面貌的绝不只是作品内容。“在文学作品的结构里,使用那些语言手段,是同作品的内容有机联系着的,又是由作家对这个内容所报的态度决定的。”(Виноградов 1959: 91) 一部真正客观的小说,必然是经过作者的意识对所描写和叙述的一切内容把握的结果。没有这种外在稳定的作者立场,没有稳定整体通关的作者视野,就不可能有对人物和事件完整、有力的把握和表现。就像阿诺德·本特涅(Arnold Bennett)所说“作者的心志气质贯穿于小说的每一页上,透过它来观察现实”(王春元 钱中文 1985: 395)。

作家态度决定描写什么、怎样描写,这自然间接规定如何采撷和运用语言,从而形成独特的修辞体系。此外,作家对艺术现实的态度,即作家的情志,又依靠作家偏爱的艺术手法获得物质的表现和存在。作者的态度和情志左右内容的取舍,也决定形式的选择,笼罩着一切,构成整个作品的灵魂。(白春仁 1993: 259) 作者表现自己态度的方法差异很大。例如同是讽刺作品,谢德林(М. Е. 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直抒情志、不假曲笔;契诃夫(А. П. Чехов)则含蓄平和、不露声色;果戈理(Н. В. Гоголь)则介于二者之间,有时慷慨激昂,有时娓娓叙来。显而易见,表现评价态度的不同方法,对于形成作品的修辞特色和艺术效果起举足轻重的作用。

作家对艺术现实的态度(即作者的情志)和语言审美观合二为一就形成一部作品中的作家形象。作家形象是文学语言风格的灵魂,它决定作者写什么和怎样写。对于分析原作如何实现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以及对于认识原作的文体特点,作家形象就像一把打开房门的钥匙。苏联文艺理论家和语言学家维诺格拉多夫指出,唯有坚持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在形象世界和语言修辞的相互关联、相互制约中,才能真正理解作品修辞的所以然,认识它的规律和特色(Виноградов 1959: 87-91)。在翻译时,作家形象犹如在漆黑的夜里为在茫茫大海中行驶的航船指引航线的灯塔,它引导译者译什么和怎样译。评价译本的一个尺度就是原作的“作家形象”在译文中是否完整。这可以概括为文学翻译修辞选择的“整体性”原则,原作的词语在译语中往往有多个词语和其对应,究竟选择哪一个合适呢?译者在举棋不定、难以取舍时,须要以“作家形象”作参照。

深刻理解“作家形象”在诗歌翻译中尤为重要。中国的格律诗抗译性极强,成功的译者稀少,而庞德(E. Pound)翻译的中国古诗《中国》(Cathay)在西方兴起一股“中国热”,这说明庞德的翻译是成功的。庞德的成功在于他掌握了诗歌翻译的奥秘:诗歌译者只有深入原诗作者的思想,钻进原作者的灵魂深处,才能与原作者达到神合。译诗不是翻译词句,而是用凝缩、简练、含蓄的语言突出原诗的意象美。(Pound 2003: 52)

不仅翻译诗歌如此,在小说翻译中深刻理解“作家形象”也极为重要。福克纳(W. Faulkner)作品的抗译性极强,以翻译福克纳作品而闻名的李文俊先生把翻译喻为“行人寥落的小径”。上世纪80年代初,李文俊开始翻译福克纳作品时,曾写信给钱钟书先生请教几个问题。钱钟书在复信中说“翻译(福克纳)恐怕吃力不讨好。你的勇气和耐心值得上帝保佑”。福克纳难译,而《押沙龙,押沙龙!》更是难上加难。从第一段就可以看出,翻译这部作品,译者要面临巨大的挑战:

① From a little after two o'clock until almost sundown of the long still hot weary dead September afternoon they sat in what Miss Coldfield still called the office because her father had called it that — a dim hot airless room with the blinds all closed and fastened for forty three summers because when she was a girl someone had believed that light and moving air carried heat and that dark was always cooler, and which (as the sun shone fuller and fuller on that side of the house) became latticed with yellow slashes full of dust motes which Quentin thought of as being flecks of the dead old dried paint itself blown inward from the scaling blinds as wind might have blown them. /在那个漫长安静炎热令人困倦死气沉沉的九月下午从两点刚过一直到太阳下山他们一直坐在科德菲尔德小姐仍然称之为办公室的那个房间里因为当初她父亲就是那样叫的——那是个昏暗炎热不通风的房间四十三个夏季以来几扇百叶窗都是关紧插上的因为她是小姑娘时有人说光照和流通的空气会把热气带进来幽暗却总是比较凉快,这房间里显现出一道道从百叶窗缝里漏进来的黄色光束其中充满了微尘在昆丁看来这是年久干枯的油漆本身的碎屑是从起了鳞片的百叶窗上刮进来的就好像是风把它们吹进来似的。(李文俊译)

在福克纳的作品里,这样的长句比比皆是。即便如此,李文俊却说,“长句子并不是惟一的困难。福克纳的作品是一个整体,必须对他的全部作品大致有所了解,才能译好其中的一篇。福克纳是语言艺术大师,文风时庄时谐,有时像莎士比亚和艾略特(T. S. Eliot),有时却又土得掉渣。这一切均须译者悉心体会,紧紧追随”。李先生所说的“福克纳的作品是一个整体”指的就是在福克纳作品中,作家的思想情感和语言审美趣味是贯彻如一的。纵

观李先生的翻译作品,福克纳原作中字里行间所闪现的“作家形象”在其译文中得以完整保留。

朱光潜说,“翻译的第一要领是吃透原文。只有尚不理解的,不存在无法表达的。然而每个字都认识不一定能理解,字面上理解也不等于真理解,只有全面地理解了作者,才能吃准他的一个词、一句话所包含的潜在意义”(艾珉 1998: 189)。作家形象应贯穿文学翻译修辞始终。在文学翻译中,不提倡伽德默尔(H. G. Gadamer)式无视作者意愿的阐释性翻译,这只能导致混乱的相对主义;还要警惕解构主义提出的“作者死了”和“文本没有中心”等过激观点,这些观点用于文学阅读也许适宜,但是用在文学翻译中,只能使译文缺乏完整的统一性、支离破碎,导致文学翻译中的胡译乱译,损害作者声誉,破坏读者阅读兴趣。

文学文本的作者和译者是两个互动的创作个体,译者必须在深入作者的世界观和审美观体系以及艺术手法的基础上开展翻译活动。

2 译语环境

道格拉斯·鲁滨逊(Douglas Robinson)指出,勒内的研究呈现出一个完整的内部翻译理论体系,然而他忽略翻译的外部研究,即政治和社会对翻译的影响;理想的做法是把翻译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结合起来(Robinson 1993: 46)。译语环境是外部翻译学内容之一,它包括译者生活的时代背景、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时代文风和翻译理念等。时代背景、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对翻译内容、译什么和不译什么有重大影响,例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在我国的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西学东渐”翻译浪潮、20世纪50年代中苏友好时期我国出现的大量苏联文学译作。时代文风和翻译理念则对译文的修辞面貌有重要影响,我们将对此展开论证。

译者选择什么样的修辞策略,固然是个人的事情,是每个译者自由选择的结果。但是,他的修辞行为也或多或少地要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尽管有少数译者能对抗自己时代的风气,甚至反其道而行之、选择一种与时代流行趣味不同的方式翻译,但这种对抗的效力毕竟有限。歌德(J. Goethe)就认为艺术的兴亡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时代,而不是个人。

事实上,更多的译者都是时代风气的追随者,是自己时代的影子,他们按照自己所处时代的流行标准和模式进行翻译。时代风气对翻译修辞的影响,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大。时代风气和精神气候的变化往往会导致翻译修辞的变化。例如汉末佛经翻译尚质直,但六朝时期的译经大师鸠摩罗什则主张文饰,这与六朝时期崇尚绮丽的文风分不开。奈达说,即使最优秀的译本生命也至多50年。因为50年后,读者的语言审美趣味已经有所变化。

奈达说出一个令译者沮丧而又振奋的道理——名著复译的必要性。每个时代的文风是不同的,译文的文风深深打上时代文风的烙印。我们通过阅读同一名著不同时代的译本,马上就会感到译文语言风格的明显不同。例如《简·爱》的第一个译本很具章回小说的特点,译者有深厚的国学渊源和根基。通过对《简·爱》当今其他译本的比较,可以明显看出不同时代的翻译作品具有不同时代的语言风格。对比《死魂灵》的4个译本(译者分别是鲁迅、满涛、郑海凌和田大畏),也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

译语环境对译者表现出强大的规约力,像一只大手左右着译者的意识,使他不能逃避其影响。钱钟书说,“就是抗拒或背弃这个风气的人也受到它负面的支配,因为他不得不另出手眼来逃避或矫正他所厌恶的空气”(钱钟书 2002: 102)。严复翻译《天演论》时本着救亡图存的目的,为让当权者觉悟“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道理,严复使用当时封建士大夫乐于接受的桐城派古文体,桐城派大儒吴汝纶盛赞严复译文语言之美超过赫胥黎(T. H. Huxley)原文。这些年来,中国在改革开放,世界在变成地球村,读者的目光都投向海外,读者的这种心理决定了读者对外国文学作品的接受倾向。李文俊说,“据我体察,现今的读者反倒对莱阳梨般入口即化的译文不太放心,宁愿费力去嚼带血的牛排”(许钧 2001: 190)。这一点在文化翻译中表现尤为突出,读者更愿意读到原汁原味的异国文化,因此在翻译隐喻、成语、谚语、俗语、习俗等和异国文化密切相关的语言现象时,使用“异化”翻译策略则成为当代的风气。

译者总是在一定的翻译思想影响下成长,总是在一定的艺术风气里劳作。翻译思想和艺术风气影响制约着译者的审美观念、欣赏趣味、表达习惯和评价标准,形成某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规范。译语环境是一种传统势力,左右着译者的审美意识和表达方式。不论是翻译实践还是翻译研究,都不能不考虑译语环境对翻译修辞的影响。然而,传统和习惯不一定就是科学的和正确的。中国的传统翻译观念以“信”为本,离开“信”就不成其为翻译。很多译者,甚至一些作家出身的著名译者,在“信”的观念支配下,翻译出李爽学在评论梁实秋译莎士比亚时称为“被原作绑住”的译文,这种译文好似饭菜夹砂,生硬硌牙,替原作者拒绝了读者,断送了原作在另一个国度的生命;译者要摆脱非理性观念,就需要理论上的照亮和创新意识的指引(郑海凌 2005: 13-14)。对比语言学和语言论美学犹如温暖的春风,吹了整整一个世纪,终于吹开裹在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上面的冰层。译界同仁终于认识到:不同民族的语言并不是由相互对等的同义词组成;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性,语言文字所蕴含的暗示力和精神韵致按照语法规则翻译过来,在另一个文化语境里往往发生变异或流失。语言文化的差异性使得译者不得

不对原作的语言形式进行艺术再创造。“神似”、“化境”、“与原作优势竞赛”、“和谐”等译论就是对翻译活动艺术再创造的修辞本质的生动体现。经过一代代译界同仁的不懈努力探索,翻译活动的艺术再创造性渐渐成为一种科学常识。

译者在一定的译语环境生存呼吸,译文风格不可避免打上时代的烙印,但译者要保持理性的头脑,对译语环境做出正确的评价,趋利避害。

3 译文读者

翻译的目的是阅读。选择最有效的修辞技巧以便让读者懂得和喜欢读就成为翻译追求的重要目标。译者与读者之间是一种互相依赖的对话关系、合作关系,译者必须尽一切努力通过有效的修辞使自己的译作成为便于读者阅读的文本。文学翻译修辞目的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读者的阅读效果。

别林斯基(В. Г. Белинский)认为,能否被读者接受是影响文学生存的重要因素,“获得公众支持,也就是说,文学作品能被社会所注意,所接受,这构成文学存在的最重要条件之一”(别林斯基 1980: 123)。艾略特指出,“正是我们读起来不费力的文学,才可能最容易和最不知不觉地影响着我们”。因此,让读者欣然阅读也是文学翻译修辞的重要目标,译者必须通过积极的修辞努力,扫除读者在理解上可能产生的障碍。明代文学家冯梦龙指出,小说的其他效果(如情绪感染效果与道德进化效果),都取决于小说是否“能俗”,能否满足大多数普通读者的阅读要求。宋人话本《冯玉梅团圆》中说,“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这上半句强调的也是文学作品应该具有能为普通人所接受的可读性。孙犁先生说,这句话“是当时的说书人、小说作家的座右铭吧……也该是我们的座右铭了。我觉得这是中国传统小说很宝贵的传统”(钱理群 1997: 414)。这句话也可以作为文学翻译的座右铭。

缺乏向广大读者开放的可读性,不仅意味着译者修辞上的失败,而且必然影响译文的前途。“从西方接受美学理论的角度来看,一部作品如果未经读者阅读,它还只能算是一摞废纸。作品的生命力在于读者的阅读里。再好的作品,如果读者看不上,它的生命力也就很有限了。”(郑海凌 2005: 328)小说是一种家常、平易的叙述文体,它必须在意听者的态度,必须替读者着想,必须把可读性和可读效果当作判断一部小说翻译是否成功的重要尺度。译者在翻译中所做的一切修辞性努力,都是为最终能让普通读者愉快阅读译文。读者这一因素的存在潜在地给译者施加无形的压力:译文语言必须引人入胜。为赢得读者的青睐而翻译从来都是译者竭尽全力打磨语言的潜在动力,生硬晦涩的译语减损读者的阅读兴趣,阻滞

读者与作者的共鸣体验,挫伤读者的阅读热情和阅读兴趣,最终使译文缺乏活力,前景黯淡。

修辞的目的在于说服受众接受信息发送者的观点和立场,在于通过有效语言手段的选择,影响别人的思想和行为,尤其是净化他们的伦理情感和影响他们的道德行为。这是以亚里士多德《修辞学》和朗基努斯《论崇高》为代表的欧洲古典修辞学的精神和灵魂。(李建军 2003: 16)文学翻译修辞就是译者通过自己在文学翻译中的修辞介入,弥补因语言差异性造成的译文语言美学效果的流失,创造文学性和忠实性辩证统一的译文,说服读者接受作者在文学中所塑造的人物所宣达的信念和价值立场,从而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建立一种积极的交流关系。译者是一个想向读者讲话,想让读者去阅读,尽一切可能使他的译作被阅读的一个人。文学翻译的成功不仅取决于译文是否接近原文,而且还取决于译作的美学作用。文学翻译必须具有较高的美学欣赏价值才能为读者接受,才能有助于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或者正如伟大的列夫·托尔斯泰所说,才能成为“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流的手段之一”。成功的译文无不以让读者欣然接受为修辞宗旨,试以我国古典名著《西厢记》的英译为例。把《西厢记》翻译成英文且让英美读者接受,其中的困难可想而知。许渊冲先生的译文“格调优雅,韵律严整,遣词造句十分精到,充满了传神的西方诗学中的意象和典故。读起来琅琅上口,妙语连珠,毫无雕琢斧凿之痕迹,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英国智慧女神出版社评价许渊冲的英译《西厢记》:“在艺术性和吸引力方面可与莎士比亚媲美”(郑海凌 2005: 248)。许先生的译文体现出他的翻译目的,“使读者知之、乐之、好之”。

使用诗化语言是文学作品修辞上的“前景化”特征,也是文学文体区别于实用文体的突出特征。文学翻译必须使用诗化语言才能吸引读者,译者在翻译中要重视读者因素,要能跳出原作语言形式桎梏,按照译入语遣词造句习惯进行艺术再创造,在语言审美效果上和原作一致,文学翻译要讲求译语的文学性。但是,坚持文学翻译的文学性并不是说译者可以天马行空,随心所欲地脱离原作随意泼墨,坚持文学翻译的文学性要警惕林纾式的“美言修辞”。译者的职业道德要求文学翻译的文学性应该以忠实性为基础,但“忠实性”并不是死译硬译,我们反对纳博科夫式的“悔言修辞”。优秀的译作应是文学性与忠实性的辩证统一。(徐红 2015)好的译文与原作貌离神合,为原作吸引读者,而不好的译文则与原作貌合神离,替原作拒绝了读者。译文不仅要在语义上和原文等值,而且更要在审美效果上和原文等值。是否吸引读者是评判译文质量的重要参数,这正如著名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奈达所说,译语接受者对译文的理解能够像原作读者对原文的理解一样,这是翻译得以进行的基础。翻译的服务对

象是读者,要评判译文质量的优劣,必须看读者对译文的反应如何,同时必须把这种反应和原作读者对原文可能产生的反应对比,看两者反应是否一致。(Nida 1993: 175)

4 结束语

文学语言汇集语言的精华,准确性、适合性、生动性和鲜明性都集中地体现在文学文体中,而语言的形象性和艺术性则构成文学语言的核心。作家在运用形象思维再现现实生活时,既能巧妙地运用语言的常规,又敢于偏离语言常规而创造性地运用语言。因此,文学翻译离不开对文学语言的分析。翻译修辞研究关注译文如何生成、译者如何选择语言等,研究译者如何运用不同的手段和方法来提高译文表达效果,再现原作的文体效果。

文学翻译从表面上看正如多数人认为的那样,不过是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索罗金就怀疑文学翻译的存在,认为所有的翻译都是语言转换(Сорокин 2003: 78)。勒内也认为,翻译是语言和意义的移植,翻译只不过是另一种语言解释原文的内容(Rener 1989: 26)。在勒内看来,任何时代的译者,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怎样对待源语文本(词对词,还是句对句),怎样重新安排句子顺序,词性是否需要对应?(郭建中 2000: 33)索罗金和勒内的观点具有普遍性,说出多数人的想法。然而,文学翻译修辞不只是一个语言学问题,众多语言外因素影响译者的修辞取舍。语言内因素是显性的,而语言外因素是隐性的。

语言的内外因素直接影响翻译修辞的选择。本文研究的作者形象、译语环境和译文读者是最为重要的语言外因素,它们看似与译文修辞生成无关,但却在译文中体现。总之,在翻译过程中,语言外因素和语言内因素一起左右着译者的修辞选择。优秀的文学译者,要遵循文学性与忠实性辩证统一的修辞原则,在纷繁的语言内外因素之间自由穿梭,克服语言文化的差异性,“从心所欲不逾矩”,翻译出经久不衰的译文。

参考文献

艾珉. 且勿损害大师形象[A]. 翻译思考录[C].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白春仁. 文学修辞学[M]. 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
别林斯基. 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郭建中. 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李建军. 小说修辞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钱理群.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4卷)[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钱钟书. 七缀集[M]. 北京:三联书店,2002.

王春元. 钱中文. 英国作家论文学[M]. 北京:三联书店,1985.

徐红. 文学翻译的辩证观[J]. 外语学刊,2015(4).

许钧. 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郑海凌. 译理浅说[M]. 郑州:文心出版社,2005.

Coleridge, S. T. *Coleridge's Responses: Selected Writings on Literary Criticism the Bible and Nature* [M]. New York: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Ltd., 2008.

Nida, E. A. *Language and Translating*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3.

Pound, E. *Poems and Translation* [M]. New York: LOA, 2003.

Rener, F. M. *Interpretation: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from Cicero to Tytler* [M]. Amsterdam: Editions Rodopi, 1989.

Robinson, D. Decolonizing Translation [J]. *Translation and Literature*, 1993(2).

Виноградов В. В. О языке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M]. М.: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59.

Сорокин Ю. А. Переводоведение: Статус переводчика и психогерменевт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дуры [M]. М.: ИТДГК “Гнозис”, 2003.

Толстой Л. Н. Сборник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Л. Н. Толстой [OL]. <http://www.dowladsoft.ru/collected-works/84126-Intolstoy-sbornik-proizvedeniy>, 2013.

定稿日期:2016-03-06

【责任编辑 陈庆斌】